



泱泱大国的文化心态 <<<



● 石云涛

怀柔天下的大国姿态

唐朝建立之初,北有东突厥,西北有西突厥,成为唐之强敌和唐交通西域的障碍。历史注定,这个伟大帝国要屹立于东方,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强国,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。

对于突厥,唐采取远交西突厥、近攻东突厥的策略。太宗贞观四年(630年),唐将李靖统军出征,击灭了东突厥,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,唐朝声威远及异域。这一年,“西北诸藩咸请上尊号为‘天可汗’(意为可汗之上的可汗)”。对于这前古未有之尊号,太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他征求群臣的意见,群臣高呼“万岁”。于是太宗接受了这一尊号,对西域各国君王进行了册封。这“天可汗”的称号,不是唐太宗一人的荣耀,而是古代中国前所未有的、一种世界大国地位的尊荣。

唐灭东突厥后,与西突厥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。贞观十四年,唐将侯君集率军取高昌,西突厥畏惧不敢救,唐于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。贞观二十二年,唐军击平龟兹,移安西都护府于此,置龟兹、焉耆、于阗、疏勒四个军镇,唐朝取得了西域控制权。这一年,西突厥五咄陆部与碎叶川西(今中亚楚河)的五弩失毕部内战失利,遣使向唐请降。随着唐朝政治上的日趋稳定、经济上的日趋繁荣和对突厥战争的胜利,唐朝在世界上的威望与日俱增。

丝绸之路复通,唐朝发展了与西域、中亚以及更远的南亚、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。它的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很快便对当时世界各地、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到中国去,学习汉文化,成为东亚日本、新罗以及中亚诸国士人的共识,到中国去,获取精美的丝绸从事转手贸易,对于中亚、南亚、波斯的商人特别具有吸引力,唐朝文化开放,各种宗教

兼收并蓄,所以世界各地的宗教徒都希望到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。于是,国使、留学生、学问僧、商旅纷纷奔波在通向大唐的陆道与海路上,到长安学习政治制度、儒释道、汉语以及唐人的服饰礼仪,把这些带回和传入本国,成为他们的神圣使命。

太宗不失“天可汗”的胸襟和风度,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姿态,一边注意吸收外来文明,一边慷慨大度地输出自己的文明。他统治下的唐朝向全世界开放,中外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时期。

在8世纪下半叶前,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,长安百万人口中,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到百分之二,如果加上突厥后裔,会达到百分之五左右。在长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随时可见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、入华译经传教的南亚僧侣、胡族出身而入仕唐朝的朝廷官员或番将、成千上万的太学中的外国留学生……他们相貌、服饰、语言、习俗不同,但都和长安人一样,共同享受这伟大帝国的繁华。

入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担任官职,可以经商置业,可以带兵打仗,可以娶妻生子(只是不允许将中国妇女带出境外),像今天拿到了美国绿卡的人在美国生活一样,他们在中国跟中国人一样生活,甚至比今天在美国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、权利和自由。唐太宗说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太宗之后,唐朝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基本上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。因此,唐朝诸帝始终享有“天可汗”的地位和美名。

玄奘西游:从学习到超越

贞观元年(627年)九月的一个深夜,两个人影在离玉门关十余里处的瓠

卢河西进,他们小心翼翼,生怕弄出声响惊动了戍边的兵士。在夜幕的掩护下,他们成功地搭桥越过湍急的河流。前边还有五座烽火台,如果不被发觉,穿越烽火台,就可越过边境,完成这次冒险的“偷渡”。

这二人正是唐朝著名高僧玄奘和一位名叫石盘陀的胡人。过河之后,石盘陀再不敢前进,他担心触犯王法而累及家人,于是玄奘一人冒险越境,欲经西域至婆罗门国(今印度)寻求佛法。

唐代前期,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,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。这时印度佛教的发展也正达到它的顶峰。自东晋法显去海还从印度取经以来,由于中外交通的畅达,为佛教徒的往来提供了物质基础,因此到印度求法的中土僧人不绝于途。

在西行求法的众多僧人中,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最杰出贡献的当属玄奘。

当时大唐如日东升,正在太宗领导下走向强盛,而玄奘是一位饱学之士,在佛学界已经声名显赫,造诣颇深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冒险“偷渡”,历尽艰辛去寻求佛法呢?

实际上玄奘此举代表了一种精神,一种心态,那就是虚怀若谷的吸纳学习精神。一个伟大的民族,绝不会固步自封,绝不会盲目自大,对于域外文化,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。这正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健康心态——学习是为了超越。唐边将严防“偷渡”,并不是封闭国门,拒绝与域外交流,只是因唐与突厥对峙导致边境形势严峻而采取的临时措施。

另一方面,佛教文化对于中土来说,是一种新的学说,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,因此受到中国人的欢迎。但佛教传入中国以来,中国佛教徒对其教义理解不明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立志佛学传播的玄奘决心效法法显等人,去印度求取佛经原本,探究佛学底蕴,“以问所惑”。

逾越玉门关后,玄奘历尽千辛万险,终于经梵衍那(今阿富汗巴米扬)、迦毕试(今巴基斯坦喀布尔),进入五河流域的健陀罗(今巴基斯坦白沙瓦),到了当

时的西印度境内。他在跋达罗毗诃罗寺研习佛学三个月,开始了他对佛学中心中印度的巡礼。

玄奘以留学生兼访问学者的身份,在中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,最后在那烂陀寺留学研习五年。在这里,玄奘师从方丈戒贤法师,学习大乘、小乘并吠陀、因明、声明、医方明等,并遍览一切佛教经典,还学习了婆罗门教和梵书。

五年后,玄奘进行了第二次周游五天竺(当时印度境内小国林立,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部分,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),一路遍访各地名师,641年又回到那烂陀寺。戒贤让他主持那烂陀寺的讲座,给全寺僧众开讲《摄大乘论》和《唯识抉择论》。玄奘用印度语开讲经义,论述精微,说理晓畅,听者踊跃,名扬全印度。

在佛学的家乡讲佛学,岂不是班门弄斧?可玄奘居然把“斧”变得比人家还精彩。他的留学和讲学活动取得了意外的效果,在广泛学习大有所获的同时,也完成了超越——既展示了他个人的学术修养和道德学问,又传播了大唐文化。可以说,玄奘是历史最有成就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之一。此次讲学之后,玄奘启程回国,带回许多佛像和经论。

玄奘归国后,受到唐太宗的极大重视。为了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,唐太宗令宰相房玄龄负责玄奘译经的一切所需。

玄奘的游学活动加强了中国和印度的联系。玄奘向印度人宣传了大唐文化,推动了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。后来戒日王遣使和唐通好,与玄奘所起的搭桥梁作用有很大关系。玄奘回国以后,仍与印度僧人有书信来往。据说他曾把印度久已失传的《大乘起信论》译汉为梵,此外他还奉太宗之命,将《道德经》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去。玄奘的译经传教,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,日本和韩国的僧侣也纷纷投到玄奘门下。

鉴真东渡 慷慨大度的施与

唐玄宗天宝元年(742年),日本僧人荣毅、普照至广陵郡(今扬州),邀请大明寺高僧鉴真东渡。鉴真认为日本是“佛法兴隆,有缘之国”,便问众僧谁愿与之

同行,众僧皆默然不应。祥彦回答:“彼国太远,性命难存,沧海淼漫,百无一至。”鉴真说:“是为法事也,何惜身命?诸人不去,我即去耳!”受他感染,祥彦等21人表示愿意随他东渡。时年鉴真55岁,与玄奘出国不同,他是作为导师受到邀请而去的。

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流行,日本急需懂得佛教戒规、主持僧尼出家受戒的学问僧。因此,日本朝廷派人到唐朝聘请德高望重的律学高僧赴日。鉴真面对日本所请,毅然不顾风波浪险,决心东渡,代表了历代中国人对邻邦和异域慷慨施与的豁达和大度。

然而,鉴真等人的东渡之行却极不顺利。第一次由于同行之人内部矛盾和“海贼”活动,淮南采访使取消了造船和备办干粮的计划,未能成行。此后,从天宝二年(743年)十二月到天宝九载,鉴真一行先后又进行了四次尝试,但均告失败。特别是最后一次,船遇大风,漂流到南海,因南方炎热潮湿,鉴真患眼疾不愈,遂致双目失明。

天宝十二载,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请玄宗派鉴真和弟子五人到日本传戒,玄宗想把道教传入日本,于是要求使臣同时邀道士东渡,可当时日本统治者不奉道教,使臣颇感为难,就建议留人在唐学道士法,但也不便再奏请鉴真等人东渡。日本人求学心切,藤原清河向鉴真表示:“愿和尚自作方便!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,行装具足,去亦无难!”鉴真听后,不顾双目失明和众人善意劝诫,执意搭乘日本副使第二舶东渡。当年十二月二十日,抵达九州南部萨摩国,日本朝廷遣使迎接慰劳。第二年至首都平城京(今奈良),住东大寺。经过10余年的努力,鉴真终于实现了东渡的愿望,时年67岁。鉴真在日本生活了近10年,于763年五月圆寂,埋骨于海东。

鉴真所学以律宗为主,他在东大寺立坛授戒,后又建立唐招提寺,作为传戒的中心,日本律宗从此建立。他的弟子如宝等后来都成为有名的“律师”。鉴真东渡时还带去一部分天台宗、密宗的著作,他和他的弟子也讲授过天台宗经典,日

本天台宗、真言宗的开创也与鉴真有关。当时日本寺院中所用经典,大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,凭口耳相承传袭下来,讹误较多,受日本朝廷委托,鉴真对这些经卷一一加以订正。

鉴真又是一位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,他对日本文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。随同鉴真东渡的共有24人,鉴真和他的弟子不仅传授戒律,还把中国的建筑和雕塑艺术介绍到日本。唐招提寺的殿堂是鉴真和他的弟子们设计、指挥建成的,其中的佛像有的是鉴真从中国带去,有的是到日本后雕造。鉴真还带去了干漆夹纆像雕塑技术,唐招提寺的木雕群是日本雕刻史的起点。鉴真赴日时携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法帖,这在中国已属难见之国宝,在日本极受珍视,孝谦天皇在东大寺大佛前造大献物帐,把二王真迹献给大佛。鉴真的弟子中也有长于二王书法的,后来日本书坛流行王字,与此有极大关系。鉴真还精于药理学,并通晓医道。因此,他长期被日本药商奉为始祖。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中有《鉴上人秘方》一卷,是他对日本医学的贡献。

伟大的文化使者鉴真大师的东渡,体现了盛唐时代中国人慷慨无私的精神风貌和伟大气魄。日本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,以鉴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使者也不辞艰辛东渡扶桑,传播中国文化,这些都大大提升了日本国的社会文化水平。不仅日本,当时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和民族,特别是韩国、越南都在文化上受益于大唐文化的滋补和沾溉,并因此促使本国本民族文化长足进步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人始终以赞助邻邦为己任,站在文化的高峰,无私地对周边国家和民族施以援手。

但是,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国未必事事高于别人,唐之所以成为强国,正在于它博采众长,从异质文化中获取有益的营养,壮大了自己,正所谓大海不择细流,高山不拒抔土。而作为强国的主人,吸纳异质文化之长,需要一种态度和心胸,那就是谦虚谨慎、虚怀若谷和大胆的“拿来”精神。这种虚心正是强大的表现,

学习是途径,超越是目的。

正如鲁迅所说: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,但魄力究竟雄大,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,或者竟毫未想到,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,就如将彼俘来一

样,自由驱使,绝不介怀。”一个民族的强盛,一种文化的发达,是把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作为宝贵遗产加以吸纳和继承的,封闭和排外只能造成徘徊不前甚至倒退落后。



近代留学生的永恒使命 <<<



● 王克强

“公元1500年前后,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。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,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,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。郑和死后,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。五百年来,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,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,它们是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罗斯和美国。”

《大国崛起》中的这段话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记忆犹新,因为五百年来,我们都沉睡在“天朝上国”的迷梦中,不知不觉间,在西方列强相继崛起和竞争时,我们却惨然地退出了世界大国的舞台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“国人渐已醒”,开始步履蹒跚地低头学习。然而,与唐朝时的输入人才、输出文明相比,悲哀的我们只能输入文明以图爱国救亡。



1863年,深陷绝望之渊的容闳,接到了曾国藩的邀请。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终于看到了撕破暗夜的一线曙光,他知道,自己梦寐以求的“幼童留美计划”也许可以实施了。

从19岁到26岁,容闳在美国度过了令他刻骨铭心的七年留学生涯。在渐进式的西洋教育中,他时常将中国与美国比较,意识到中国封建体制的落伍,亡国在旦夕之间。爱国热情促使他下定决心要解救中国,因此,他抛出了“教育救国论”,试图用留洋学生来沟通与融合相互隔膜的中西文化,达到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而救亡图存的目的。但教育救国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奋发有为的政府作后盾,让清廷这样一个腐朽没落的政府去

教育救国,岂不是痴人说梦,因此容闳的计划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。从1854年到1863年,整整九年,容闳都是在理想碰壁的窘境中度过的,直到曾国藩出面,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。

曾国藩邀请容闳,完全是出于洋务救国的需要。这位封疆大吏在借助洋枪队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,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威力,产生了效法西方兴办近代工业的洋务思想。他准备在上海建造一个大型兵工厂,但因机器缺乏而难以上马,当他听说容闳留美多年、朋友广布之后,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采购机器的人才,便设法罗致。

容闳志不在采购,但他为了博得曾中堂的好感,以便争取他同意自己的留美幼童计划,于是不辞劳苦,赶往美国,买回了机器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终于开业了,曾国藩很兴奋,容闳趁机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留美幼童计划。曾国藩沉思良久,未置可否。容闳并不灰心,他还在等待机会。1870年,曾国藩被清廷派去处理“天津教案”,外交人员捉襟见肘的现实,终于让这位中兴名臣下定了决心。当夜,他就向朝廷上书,请求清廷旨准留学生计划。

曾国藩之所以答应容闳的请求,除了急需外交人才之外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洋务工厂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。就这样,派遣留学生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。可以说,洋务运动是“留美幼童”降生的产婆,而容闳则起到了助产的作用。

在幼童赴美之前,容闳先期抵美,安